

家庭與學校的兒童教



小學社

蘇聯教學經驗叢書

家庭與學校的兒童教育

著 作 者 A. C. 馬 加 林 柯

翻 譯 者 邵 勉 子

校 對 者 徐 仁 甫

出 版 者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北京(2)西太平街乙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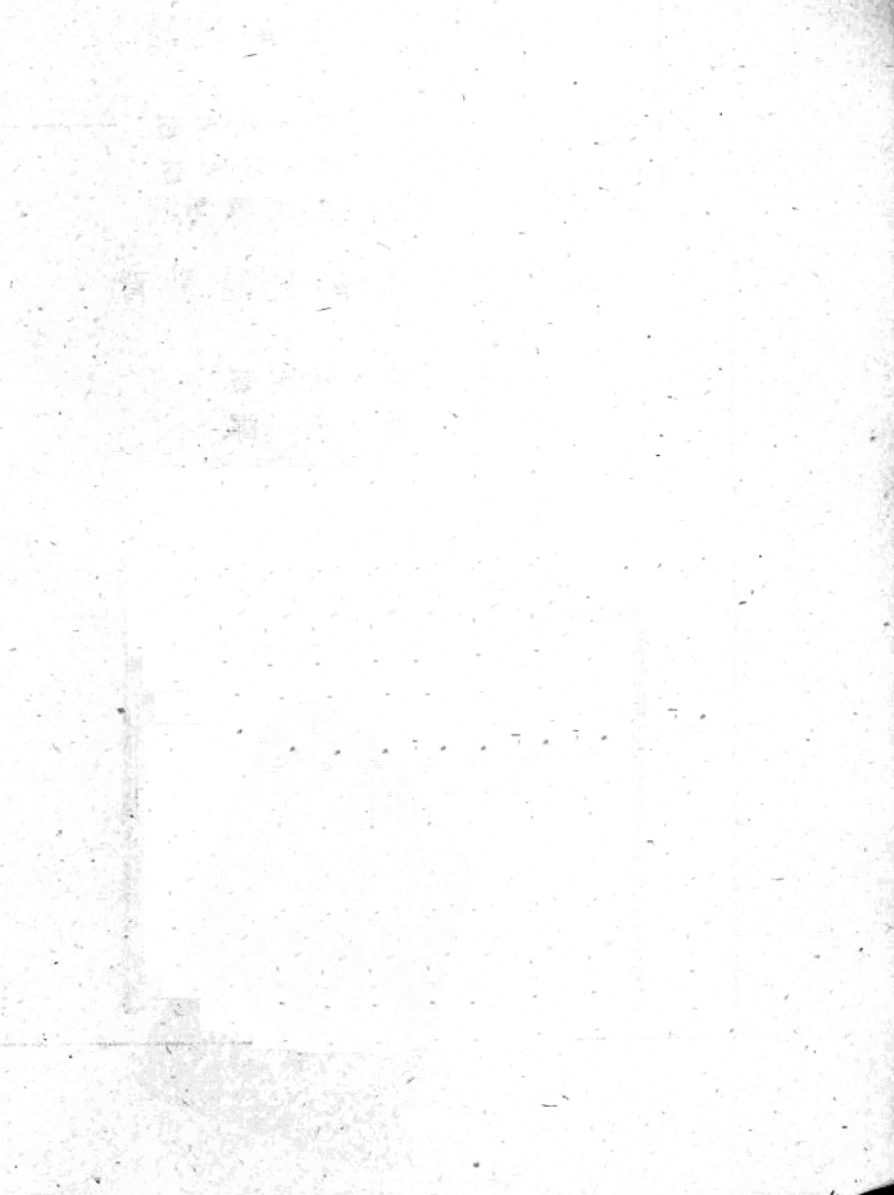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

書號(京37)·蘇教(2)·(0001—7000)

蘇聯教學經驗叢書

家庭與學校的兒童教育

A C. 馬加林柯 著
邵 勉 予 譯



『家庭與學校的兒童教育』——這個題目是很大的，談起來不止談一個晚上，甚至根本就談不完。一個晚上，我們僅僅能够談一些主要的問題。而在主要的問題上，我並不是個專家。你會問我，爲什麼呢？那是你們就會知道的。現在我簡單地和你們先談談我自己。

我是個教員。從十七歲起當教員。頭十六年我在鐵路學校工作。我是個工人的兒子，就在我父親工作的工廠當教員，我工作了十六年。這還是在舊時代舊的學校中。

我本來是個教員，後來當了工廠學校的主任。到這個學校讀書的是一個工人住宅區的工人子弟。而我自己也就是工人集體中的一員，工人家屬中的一員。我

的學生們以及家長們成爲同一工廠裏統一的工人小社會。

因此，我有很大的可能性去接近學生的家庭。你們在莫斯科，這種可能性也許比較少些，因爲你們是按照兒童的地區分佈原則來招收學生的。他們的父母不能聯系成一個統一的工人集體。你們接近家庭的可能性也許比我少些，但是，你們却有一個蘇維埃政權的優良條件。在我當時這種條件是沒有的。那時只有舊的專制的俄羅斯。

革命後，我離開了家庭，在沒有父母沒有家庭的兒童中做了十六年的工作，差不多沒有見過一個家長。

不錯，在最近幾年我又和家庭接近了，但是我在蘇維埃政權時代基本的工作，是在那根本不知有家庭的孤兒教養機關裏工作。

我曾經遇到一件值得注意的事。這發生在一個有趣的環境中。一個攝影師接受了某家電影機關的委託到我們哈里柯夫·捷爾仁斯基公社來攝影。他是一個機警的小老頭，善於觀察一切、發見一切，非常活潑、敏捷。

他羨慕公社，他歡喜一切。當我正和他在辦公室裏談論一件事情的時候，完

全出乎意外的進來一位外表頗有修養的同志，這個滿身塵土的人顯然是剛下火車，他說道：

『我是從米里托波拉來的。我接到了通知，說我的兒子瓦沙·汝托拉爾夫住在這兒。』

『是，有這樣一個人。』

『我就是他的父親。他從家裏逃出來，我尋找了半年，現在知道他在這兒，特爲坐車來找他。』

那個人很激動，他的聲音在發抖。

『怎麼樣？請你把瓦沙叫來吧。』

瓦沙來了。一個十四歲的孩子。這個淘氣孩子在公社裏住了半年。穿着制服，站有站像，看看看像，一切恰到了好處。他進來，站住，問道：

『你叫我嗎？』

『是，你父親來了。』

『我父親呢？』

這麼一來所有的常禮都沒有了：彼此撲上去擁抱，接吻，非凡的愛情：父親愛兒子，兒子愛父親……

擁抱和接吻完了。小孩子恢復了常態。父親說道：

『那麼你讓他跟我走嗎？』

『行啊，讓兒子自己來決定。他想怎樣就怎樣，他願意跟你走就跟你走。』

但是這個淘氣的孩子，剛剛是喜極而哭的，現在是臉紅了，固執地望着我，搖着頭說：

『我不走。』

『爲什麼？這不是你父親嗎？』

『反正我不走。』

父親的面色蒼白了：

『你怎麼不走呢？』

『我不走。』

『爲什麼？』

『我不走——我就是不走。』

『你爲什麼不想走呢？這是你的父親啊！』

『我不願意，我不走。』

父親開始發脾氣：

『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我要帶你走。』

當時我的隊長們干涉了。

『這兒任何人你不能帶走，他是捷爾仁斯基公社社員；你可以好好地勸他，他願意——他就走，他不願意——他就不走。』

父親倒在安樂椅上。他來了一陣歇斯底里。人們亂做一團，人們安慰了他，給他水喝。他安靜了一點說：

『請你叫瓦沙吧。』

『不，現在我不叫。』

『只是想告別一下吧了。』

我派了我自己的通信員：

『請你去問問——瓦沙願意不願意和父親告個別。』

瓦沙來了。又開始哭泣，擁抱，接吻。當一切完畢後，瓦沙問道：

『我可以走嗎？』

『可以，你走吧！』

他走開了，而我和他父親又坐上兩個鐘頭，我看着他。他坐在安樂椅上，他嘆息着，哭泣着，鎮靜了一會又哭泣。他就這樣沒有把瓦沙帶走。

但是這故事中最富戲劇性的却是我的攝影師由於這齣戲而喜極欲狂，並且全然經受不住這種感情的他，在父親和兒子哭泣，接吻，擁抱的當兒，這一切都被他巧妙地拍進了鏡頭，並很得意地說道：

『我們同行們，一輩子也難碰上一次這樣的機會。』

在這兒我想把家庭和家庭教育問題更尖銳的提出來。一九三五年我被派到烏克蘭去肅清兒童們無家可歸和無人照管的現象。在實踐中我知道了家庭怎樣教養兒童，以及這些家庭爲什麼把無家可歸的幼年犯人們捨給我們。

我常常訪問許多家庭，常常認識很多家長，常常在種種情形之下去幫助他

們，當他們需要這種幫助的時候。僅僅在這時候我才更接近了家庭，主要的是他們有着教育失敗的兒童的家庭。

在這些印象和工作影響之下，我決定寫『父母必讀』。

『父母必讀』原定四冊，因此第一冊裏不能包括一切。第一冊專論家庭就是集體的問題，超出這個範圍的其他問題不包括在內。

我想在第一冊裏指出，爲了成功地教育兒童，首先家庭應該是蘇維埃的集體。這個集體發生裂痕是由於以下種種的原因：或因父母的不和，或因雙親中一人的出走或去世，或由於制度的缺乏，父母威信的喪失，甚至由於直到現在不加重視的家庭獨子——一切使教育的條件愈加困難，因爲集體失去集體的特徵，家庭中的某些部分彷彿停止爲集體了。

我在第一冊裏僅僅研究了這一個問題。

第二冊論兒童在家庭中政治的道德的教育，當然兼顧到學校，因爲家庭和學校是分不開的。

第三冊要說勞動教育和職業選擇。

最後第四冊論述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遺憾的是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在教育學中提出，這就是怎樣教育人使他不僅成爲一個優秀的工作者，不僅成爲一個好公民，還要使他成爲一個幸福的人。請你們不要那樣想，以爲我想教人成爲幸福的人。教人成爲幸福的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教育他使他成爲幸福的人是可能的。

這是個最困難的問題，這個問題所以困難，就在於所有家長都在想這個問題。

每個家長都願意使他的孩子成爲幸福的。這是父母生活的目的。父母們爲了這個目的寧願不要自己的幸福，寧願犧牲自己的幸福，只要子女幸福就行。很難找到既不想起這個，也不願意這個的父母。假如我們看見這種人的話，我們一定會非難他們。

同志們，你們可以看到這個問題是重要的而且是很困難的，因爲幸福關係於怎樣的性格、品質？關係於怎樣的習慣、傳統，信念的發展？以及什麼是幸福？這些問題在實踐中從來還沒有得到解決。

如果把四冊『父母必讀』都寫出來，並且一次出版，當然再好沒有。那時不管你們怎樣批評都是可以的，因爲事情已經完成了。但是，我先出版了第一冊也許是錯誤的，並且許多人責難我，說我不談到這個，不談到那個。當然我所以

不談到，就因為在我的計劃中另外還有三冊。

同志們，我簡單地向你們談談我自己，講講自己過去和將來的工作。這算是小小的開場白。現在我轉到關於家庭與學校關係的基本問題。

提出這種問題是十分適合的：誰在教育——家庭呢還是學校呢？這很容易簡短地回答：既是家庭，也是學校。人們通常也是這樣地回答。

在這種情形之下應該把問題稍為改變一下：誰應當是領導的，家庭呢還是學校呢？我正在研究這個問題。我到過很多學校，到過很多家庭。很多人到我這兒來，多半是遭到各種不幸的。我們會看到對這個問題是沒有同一觀點的。

我沒有聽見過家長說：『我們應當教育，為什麼學校妨礙呢？』我也沒有聽見過教師說：『學校應當教育，為什麼家庭妨礙呢？』

通常都是那樣說：『我們是學校，你們是家長，都應該教育兒童，為什麼你們不教育呢？』家長們也反駁說：『我們把孩子送進學校，好讓學校教育他們。

為什麼學校不教育呢？』

歸根結蒂，在兒童教育事業上，無論家庭或學校，都不願意把權力握在自己

的手中。相反地，雙方中的每一方極力想把全部教育的重担放到對方的肩上。

話是那樣的說，事實上甚至會有這樣的事。假如學生學習得不好，教師就把父母叫來說（當然不是每個教師都這樣做，但是有這樣的教師）：

『你的孩子學習得不好，你要想辦法。』

『是的，要想辦法。』

這就是說，教師想道：在我的權力下是教育辦法無多，但是家庭的辦法會更多些。父母實行這些更有力辦法，孩子就要成為有教育的，至少會開始學習。個別教師們認為家庭是更有威力的教育因素，因此家庭可能比他們做得更多。

我不準備在某方面解決這個問題，不想單獨談教師，或者單獨談家庭，我是別種觀點的擁護者。在此，我要涉及我的教育主張，它常常地被認為是一種異端，但我對它仍堅持到底。

我認為把希望放在個別孤立的教師身上，那怕他是級任導師也是不可能的。為什麼呢？因為這是把希望只放在他的天才和能力上面。

如果我們想教育數千萬我們的兒童——男青年和女青年們，那麼就讓我們像

每個生產者一樣地來關心：容許多少廢品（不及格品）率呢？每種生產中都有一定的廢品（不及格品）率，有些生產是百分之點五，有些是百分之一，有些是百分之二。要是像光學玻璃那樣的生產，就得容許百分之五十的廢品（不及格品）率。

我們的生產中是怎樣的廢品（不及格品）率呢？不拘什麼時候我們想過這一點嗎？從三千萬兒童中能有多少不及格品——教育得不好的。讓我們想一想這一點。

我們先從一個簡單的算術習題說起。如果有人說容許百分之十的廢品（不及格品）率，那麼我們可以稱他為人民的敵人。因為三千萬的百分之十，就是三百萬兒童。所謂三百萬不及格兒童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三百萬人將和我們蘇維埃的道德標準背道而馳。因此我說：沒有任何一個不及格品，即連百分之一也沒有。有誰能反駁我，誰可能說在培養兒童事業中能允許那怕微乎其微的不及格品呢？我斷然的確信，並且一生都是這麼說：連百分之一不及格的，連一個被毀滅的生命都不准許。

同志們，讓我們接受這個標準量——在教育工作中，百分之一不及格的都沒有。

要是我們把希望放在個別的教師身上，這就是說，我們不只準備有百分之二、或百分之十。甚而至於，就是無數的不及格量。這就是說，我們根本把問題取消不談了：要出多少不及格品就讓它出多少，全看個別教師的能力和勤勞而定。

然而，我們有多少經驗淺薄，不善於工作的，年青的，缺乏才能的教師呢？

這麼一來，我們把這全部事情都倚賴機會——產出什麼就是什麼。

假定說，從百萬教師隊伍中，有一百個壞的教師。那麼我們就能安然地說這一百個壞教師就出產不及格品嗎？並不是這樣的，這樣提問題是不行的。不能提這樣的問題：教育是依賴於個別教師的品質或者才幹，如果我們就全蘇聯的範圍來說，如果我們想教育整個地年青的一代，那麼我們這些並非孤立的教師，而是統一的教師隊伍代表，而是統一的蘇維埃教育集團的代表，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讓個別教師負擔一切的道理。

因此，至少我的邏輯，一個對工作負責的公民的邏輯是這樣說，我的經驗也是這樣說。

我以前也這樣主張，個別的教師就是一切，正是他應當來教育。我也認為教

育就是兩個過程，像舊的教育學上所說的：教員，教員，教員；兒童，兒童，兒童——並且這一切都是單數。因此我就這樣想：我是教員，你是學生，我們是一對一，我來教育你。

但是，現在我主張，作爲一個整體的，作爲統一的學校集體的學校，它對於個別的教師，個別的學生，對於家庭應當是一個正確的教育組織，指導的教育組織。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命題，立刻就無數的學校教育方法問題堆到我們身上。所有這一切問題我們未必能够分析，然而可以指出這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關於教師的集體。

第二個問題——關於被教育集體所領導的兒童的集體。

第三個問題——教師集體與家庭。

這三個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問題又分成許多個別的問題。如果我同你們談上二十個晚上，才能談出一些東西。

我們先從教師集體問題談起。我在自己的實踐中嘗試得很多，有過很多的懷疑，並且由於這些懷疑而感到痛苦，最後，走向教師集體的確定形式。把這個問